

香港經濟發展的歷程、困境與轉型：一個比較的視角

孫 軍

Shanghai-Hong Kong Development Institute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

二零一六年十月

作者簡介

孫軍，淮海工學院商學院，博士，副教授，經濟與貿易系主任，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產業經濟、區域經濟、宏觀經濟；

E-mail：juns1979@126.com。

香港經濟發展的歷程、困境與轉型 – 一個比較的視角

The Developing Process, Dilemma and Transition of Hong Kong Economy—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摘要：

基於歷史的原因，且在完備的法律制度、自由經濟體制的支撐下，香港成為了中國對外經貿交流的最重要窗口，經濟迅速崛起，全球貿易金融中心地位由此奠定。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香港窗口優勢正在消失，當經濟上漲大勢退卻之時，大量曾經被隱藏的深層次經濟問題和矛盾開始浮出水準，這其中主要包括工業急劇萎縮、產業固化和就業排斥、收入差距日益擴大以及房地產價格的高歌猛進等。基於此，本文認為，香港經濟的再次崛起必須要充分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強化政府權威和政策落地能力。具體地發展路徑包括：推動產業跨區域融合，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和相對獨立性高的生產性服務業，從“引進來”到“走出去”轉變，重塑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一帶一路”戰略則是實現上述目的的一個重要方式。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asons and the supporting of complete legal system, free economic system, Hong Kon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window of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economic growth rapidly, the global trade and financial center formed.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the advantage of Hong Kong is disappearing. when the economy enters a period of stagnation, the large number of hidden economic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began to surface, which mainly includes industrial sharply shrinking, curing industry and employment exclusion,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and real estate prices triumph and so on.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remaking of Hongkong's economy must make full of the active government, strengthening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The pathes of development include: promoting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cross the regions, developing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with relative independence, from “bring in” to “go out”, 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status,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is the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m.

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經說過，只有（海水）在突然退潮的時候，你才知道誰在裸泳。當香港經濟上漲的大潮退卻之時，大量曾經被隱藏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開始浮出水準，以驅趕大陸遊客、旺角騷亂等為代表的典型事件凸顯了香港社會中日益存在的不滿情緒。港獨勢力漸露頭角，甚至有人開始否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則暴露了當前問題的嚴重性。這些問題是香港經濟社會進一步前進的“絆腳石”，只有正視和深刻地認識這些問題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才有可能化解矛盾，讓“絆腳石”成為“墊腳石”，推動香港經濟社會再次回到正確軌道，重新煥發“東方之珠”之風采。

一、香港經濟的潮起與潮落

宋恩榮（1998）明確指出，在香港的經濟發展史上，每一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都源於香港與其腹地之間關係的改變。1840年之前的香港還是一個小漁村，1842年8月，由欽差大臣耆英、伊裏布等人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在南京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島被迫割讓給英國，直至1997年被中國政府收回。在此期間，儘管經受著英國人的殖民統治，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所需要的健全的市場體系和法律制度已經逐步建立起來。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後，面對大量內地資金開始湧入與大陸被西方列強圍困這一局面，香港利用其區位的便利性和體制、制度優勢，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發展。資料顯示，在1949年和1950年，香港對內地貿易額就分別比上一年上升66%及74%，大大超過1947年至1949年每年增長35%的水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等西方列強對中國實施經濟封鎖、貿易禁運等政策，香港的優勢得到了進一步強化，成為了中國對外經濟貿易交流的唯一窗口。

1960年代開始，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在全球範圍內展開，“雁型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大行其道，香港比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更早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全力發展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在這段時期，成衣、手錶、時鐘、玩具等十多種產品的出口名列世界前茅，很多遠銷世界各地，製造業成為了香港經濟的支柱產業，香港國際地位從此奠定。70年代初，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居民收入水準的持續上升，香港政府開始推行經濟多元化發展戰略，金融、房地產、貿易及旅遊業等服務行業迅速發展。1978年，中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飽受高成本之苦的香港製造業開始大規模向以珠三角為主的內地轉移，再加上中國內地剛剛開放，國門尚未完全打開，巨量的產品進出口都經由香港轉口，引發了天量的資金結算業務，香港迅速實現了從製造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的經濟轉型。到80年代末期，服務業在香港GDP中的比重已超過80%，香港在亞洲乃至全球的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確立。

不過，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香港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是大陸持續的改革開放使得香港的貿易和金融優勢地位逐漸削弱。尤其是2001年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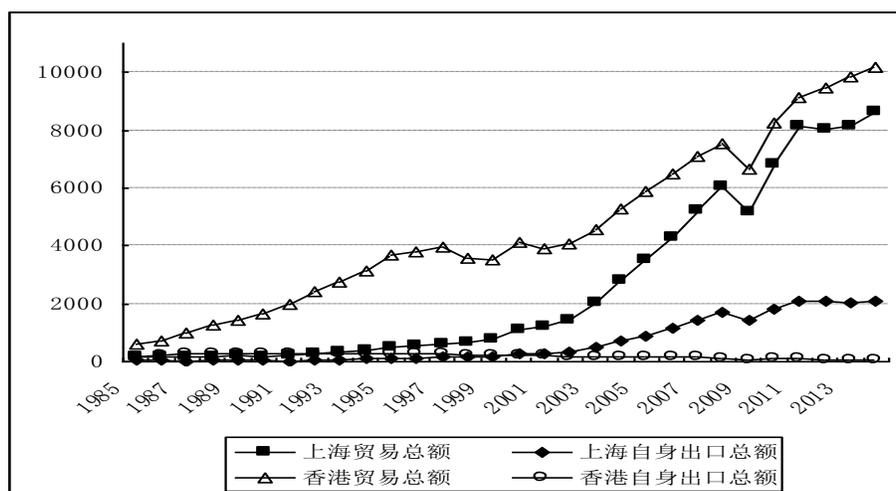
加入 WTO，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後，香港的政策紅利優勢不斷消退；二是隨著以上海自貿區為代表的越來越多的自貿區獲批，香港的制度優勢乃至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也開始受到挑戰。

（一）貿易樞紐地位滑落

由圖 1 可以看出，在 2001 年之前，雖然上海貿易額開始緩慢增長，但香港貨物貿易總額遠遠超過上海，香港作為中國經濟貿易中轉站的角色顯而易見。不過，隨著中國 2001 年 WTO 的加入，轉捩點出現了，雖然香港的貿易額在此後也一直在不斷增長，而且速度也不低，但是上海貿易額增長的速度卻更快，而且正在全速趕超香港。

另外，由圖 1 還可以看出，香港、上海兩地對外貿易額快速增長的同時，香港自身貿易出口額（內生貿易）在 1995 年達到最高峰，其後持續下滑。而上海自身貿易出口額除了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在 2009 年出現過下滑之外，一直呈現出比較穩健的勢頭。從自身出口額來看，這兩者之間的差距日益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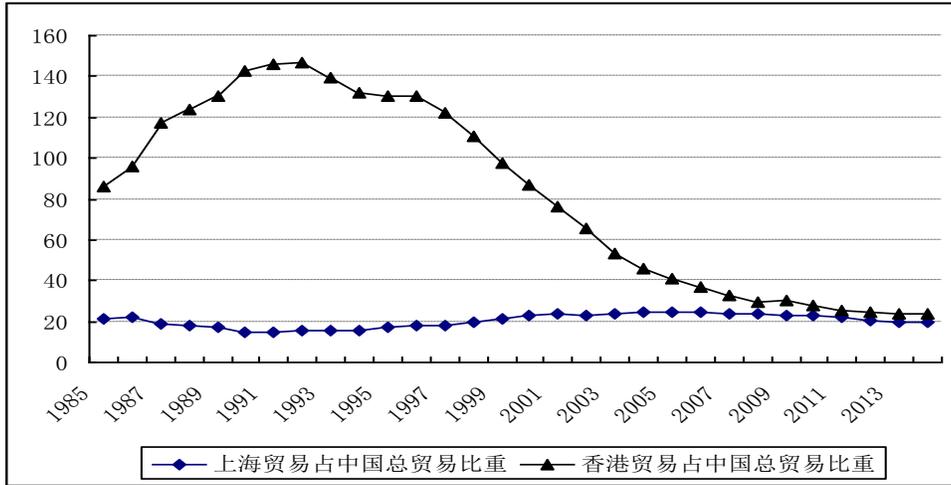
圖 1 香港、上海貨物貿易趨勢與結構（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各年的《上海統計年鑒》、《香港對外商品貿易回顧》及《中國統計年鑒》。

圖 2 顯示，香港貿易額佔中國 GDP 的比重在 1992 年達到最高峰的 130.86% 之後，其後一路下滑。儘管在 2003 年中央政府與香港政府簽署了 CEPA 協議，而且還在不斷增加補充內容，但都沒有改變香港貿易比重下滑的這個大趨勢，香港在中國貿易樞紐地位開始滑落。目前與上海貿易額佔中國 GDP 的比重已基本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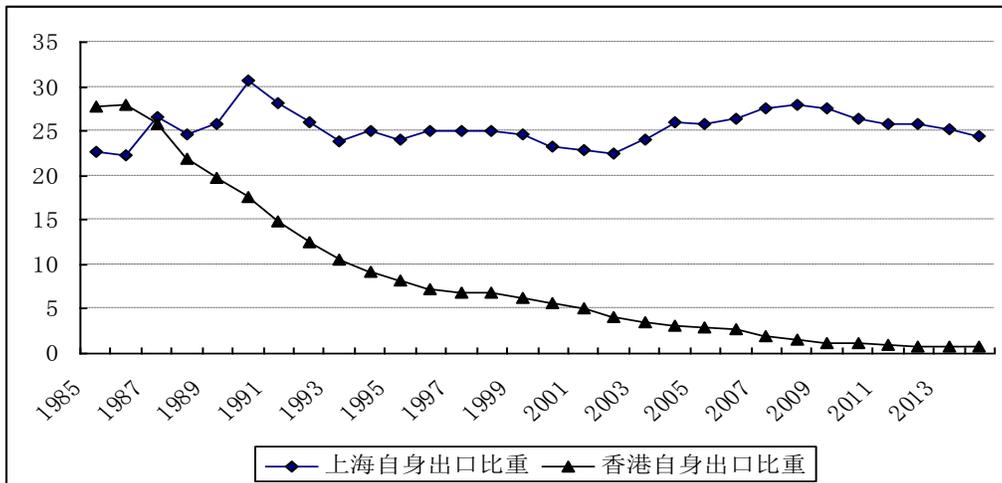
圖 2 香港、上海貨物貿易額佔中國貿易總額比重情況（單位：%）



數據來源：各年的《上海統計年鑒》、《香港對外商品貿易回顧》及《中國統計年鑒》。

圖 3 顯示了香港、上海自身貿易出口佔各自貿易比重變化趨勢。在 2014 年左右，香港的自身貿易出口只佔香港貿易總額的 0.7% 左右，基本可以忽略不計，而上海一直在 20% 左右波動。這告訴我們，香港越來越專注於自身作為貿易中轉站的較色，放棄了發展實體經濟尤其是製造業的機會，而上海雖是長三角的龍頭城市，卻仍在全方位發展。

圖 3 香港、上海自身貿易出口佔各自貿易比重（單位：%）



數據來源：各年的《上海統計年鑒》、《香港對外商品貿易回顧》及《中國統計年鑒》。

總結起來，在 80 年代，當香港低端製造業向外轉移之後，實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香港並沒有像“亞洲四小龍”中的其他“三小龍”新加坡、韓國、臺灣那樣繼續本地製造業的產業升級步伐，而是利用為內地經濟服務的契機，跨過重化工業階段，直接邁向了金融、地產、貿易等服務業行業，憑藉著與大陸天然的紐帶關係獲得發展空間。隨著大陸的進一步開放，香港經濟目前已進退失據。

（二）金融中心地位堪憂

香港早在 70 年代就開始大力發展金融業，80 年代初隨著樓市達到頂峰之後的掉頭向下，金融業陷入了危機，在這之後香港的金融業雖也有波動，但向上的發展趨勢非常明顯，並逐步成為了國際金融中心。上海金融業的起步較晚，1990 年 4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宣佈開發開放浦東，1992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上海要“逐步發展成為遠東地區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中共十四大報告提出了“儘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在這之後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裏，上海的金融業得到了快速發展，正在全力趕超香港。

表 1 顯示的是 1990 年開始至今香港和上海銀行業的存、貸款額數據。1990 年，香港的存、貸款總額均是上海存、貸款的 12 倍以上，而到了 2009 年上海的貸款總額竟已略超香港，不過其後又被香港趕超。到 2014 年，上海的存款總額是香港的 92.6%，貸款總額是香港的 83.9%，趕超的態勢一覽無遺。

表 1 香港和上海銀行業的存、貸款總額（單位：10 億美元）

年份	香港		上海	
	存款	貸款	存款	貸款
1990	158	230	13	18
1991	177	289	14	19
1992	194	319	19	22
1993	223	369	26	28
1994	251	422	26	23
1995	286	483	37	29
1996	315	506	47	34
1997	350	532	67	45
1998	387	427	68	51
1999	419	363	76	59
2000	453	316	113	88
2001	437	280	136	103
2002	425	266	170	127
2003	458	261	209	159
2004	496	277	242	181
2005	523	297	285	205
2006	612	318	332	233
2007	752	380	399	286
2008	778	422	512	348
2009	823	424	653	435
2010	883	544	771	505
2011	975	652	901	576
2012	1069	717	1007	649
2013	1183	832	1118	716
2014	1299	938	1203	780

資料來源：歷年《上海統計年鑒》及《香港金融管理局年報》。

表 2 顯示的是 1993 年以來香港和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的成交額。我們看到，在 1993 年，香港股市成交額是上海的接近 4 倍，而到了 2014 年上海股市成交額竟然反過來達到了接近香港成交額的 3 倍，2015 年接近 7 倍。雖然中國大陸股市仍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這樣的一種翻轉仍然令人有些瞠目結舌。¹

¹ 深圳證券交易所 2014 年的成交額折合成美元為 36676 億美元，成交額也早已超越香港。

表 2 香港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成交額（單位：10 億美元）

	香港	上海
1993	158	41
1994	147	67
1995	107	37
1996	183	110
1997	489	166
1998	220	150
1999	247	205
2000	402	379
2001	255	274
2002	211	205
2003	332	252
2004	510	320
2005	581	235
2006	1078	725
2007	2777	4017
2008	2267	2598
2009	2001	5073
2010	2198	4495
2011	2195	3678
2012	1710	2607
2013	1958	3718
2014	2191	6140
2015	3333	21370

資料來源：歷年《上海統計年鑒》；香港交易所歷年的《香港交易所市場資料》。

尹翔碩、黃亞鈞（1998）認為，當香港主要向外輻射，上海主要向內輻射時，就可以構成一個功能上互補的國際金融中心體系。不過在日益開放、全球化的背景下，對內和對外早融合統一，競爭已不可避免。當然，由於法治、資訊流通、監管透明度及商業糾紛仲裁、貨幣自由兌換等方面的優勢，香港在國際金融業務方面仍然遠遠領先於上海。據倫敦獨立機構 ZYen Group 發佈的權威《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顯示（表 3），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一直在第 3 和第 4 名之間徘徊，與新加坡之間互有上下，而上海的排名變化卻是非常大，在 2011 年最高上升到了第 5 名，在 2009 年則為最低的 35 名，2016 年

排到了第 16 名，與香港的差距還是非常大。²另外，香港是全球大量金融公司的亞太區總部所在地，2014 年底香港僅基金管理的資產就達到 17.7 萬億港幣，佔據了整個亞太區的資產管理近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香港管理的資產 70% 以上來自國際投資者。

表 3 競爭力比較：全球金融中心(GFCI)指數

	香港	上海	新加坡
2007 March	3	24	4
2008 March	3	31	4
2009 March	4	35	3
2010 March	3	11	4
2011 March	3	5	4
2012 March	3	8	4
2013 March	3	24	4
2014 March	3	20	4
2015 March	3	16	4
2016 March	4	16	3

資料來源：倫敦獨立機構 ZYen Group 每年發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

(三) 經濟不斷被超越的現實

上海經濟總量已在 2009 年超越香港。當然上海人口基數龐大，截止 2014 年底已超過 2400 萬，香港僅 700 多萬人，因此不太好比較，但新加坡經濟總量也超過香港的事實讓香港尤其顯得“落寞”。新加坡不論是人口數量還是地域面積均小於香港，但數據顯示，新加坡從 1993 到 2015 年間，經濟年平均名義增長率約為 6.6%，而香港同期僅為 3.5%。2003 年新加坡人均 GDP 超過香港，2010 年新加坡經濟總量首次超過香港，按美元折算，2010 年香港 GDP 約為 2286 億美元，新加坡為 2364 億美元。在上海之後，北京等內地城市的經濟總量也開始超越香港，按照目前經濟的發展速度來看，深圳也將很快超越曾經的“超級大哥”香港。

儘管陳恩（1997）早已指出，由於上海與香港社會制度不同、基礎不同、經濟腹地不同和運作方式也不一樣，香港與上海作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個龍頭，地位是共存共榮，功能是互補互利的，各有不同的特點與長處。但香港與腹地經濟的互補和互動能力越來越

² GFCI 有五大指標體系，分別是人才、經營環境、市場准入、基礎設施和綜合競爭力。這五大指標體系又分解為 57 項具體指標，同時運用了不同的評價方法，一是市場本身的各類數據，二是請金融專業人士評價，還有對普通人士進行問卷調查，最後綜合起來得出一個評價結果。

弱，作為中國開放窗口的優勢也正在消退，在珠三角的位置正在被深圳、廣州等城市替代已是既成事實，這不得不說是香港目前面臨的極其尷尬的局面。當然，對於香港來說，目前仍然擁有著便利的營商環境、完備的法律體制、自由貿易政策和資訊流通、公平開放的競爭、金融網路、通訊基建網路等便利因素，以及龐大的財政和外匯儲備、自由兌換的穩定貨幣以及低稅率的簡明稅制等優勢條件。

哲學辯證法指出，在決定事物發展的眾多因素中，內因起決定性作用，而外因只是起著輔助性作用。因此，雖然表面看起來，香港經濟的萎靡不振來源於內地的改革開放，來源於外部的不利因素，來源於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一定高度，但在深層次上，決定香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即內因一定是出現了問題。那麼，問題出在哪里、下一步如何走，是本文接下來分析和研究的重點。

二、香港經濟體面臨的嚴峻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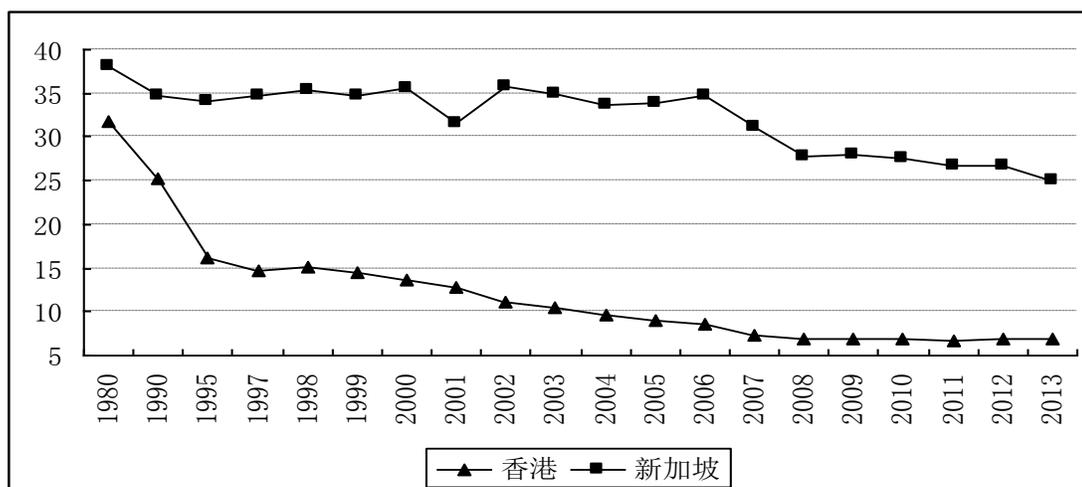
（一）工業急劇萎縮

自工業革命以來，製造業一直是各個國家和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秘訣所在。曾經的資本主義強國英國是建立在工業革命基礎之上的，而能夠趕上並超越英國的美、德和日本等國家無一不是通過構建自己的工業體系來實現的。進入 21 世紀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紛紛通過產業轉移實現“去工業化”，但 2008 年的金融危機給了他們“當頭一棒”，又紛紛回過頭來實施“再工業化”發展戰略。³

圖 4 顯示的是自 1980 年以來香港和新加坡工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趨勢。新加坡的工業比重在 1980 年超過 38%，其後一直在 35% 左右徘徊，不過從 2007 年開始也出現了下滑態勢，但 2013 年工業比重依然維持在 25% 以上。與新加坡相反，香港工業比重呈現出持續下滑的態勢，從 1980 年的超過 30% 下滑到 2013 年的 7%。應該說，工業在新加坡經濟中的高比重、在香港經濟中的低比重是目前新加坡和香港經濟的最大區別所在。形成上述後果的原因在於，香港政府實施的是完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採取不干預政策，新加坡工業的發展不單純是依靠市場機制的誘導，更主要的是政府主動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的結果。

³ 相對來講，農業受限於土地規模和技術進步的緩慢性，發展比較緩慢；工業行業的生產率和技術進步速度最快，發展也最迅速；服務業相對來說，比較穩定，發展速度慢於工業行業。在發達國家紛紛“去工業化”的大背景下，為了保持經濟的快速發展，服務業紛紛加杠杆促增長，當杠杆過高發生斷裂之時，金融危機就會到來。

圖 4 1980 年以來香港和新加坡工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趨勢



資料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工業發展的重點是製造業，新加坡 2011 年製造業主要行業增加值如表 4 所示。新加坡很多製造業中的很多細分行業在全世界範圍內都非常具有競爭力，例如電腦、電子產業是支撐新加坡經濟增長的主要行業，佔製造業增加值比重超過 30%，大量世界級的電子製造服務公司在新加坡開展業務，其中包括偉創力（其全球總部設在新加坡）、Sanmina 公司、Celestica 集團、Jabil Circuit 和 Venture 公司等。生物醫藥產業被譽為“永不衰落的朝陽產業”，佔新加坡製造業增加值比重接近 20%，被譽為亞洲最富活力的生物醫藥中心之一。另外，新加坡雖然不產石油，但卻是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和石化中心，亞洲石油定價中心不在東京、迪拜、上海而在新加坡，原因在於新加坡是唯一具備金融中心與煉油中心雙中心的亞洲城市，甚至產油大國伊朗都從新加坡進口成品油。新加坡製造業與金融業的良性互動、相互強化的特徵顯而易見。

表 4 2011 年新加坡製造業主要行業增加值

	產業名稱	增加值 (億美元)	佔製造業比重 (%)
1	電腦、電子和光學產品	182.2	31.6
2	生物醫藥	111.1	19.3
3	交通運輸設備	80.5	14
4	機械設備	61.5	10.7
5	化工產品	46.3	8
6	金屬製品	24.6	4.3
7	食品、飲料及煙草	22.2	3.9
8	印刷及記錄媒介的複製	13.2	2.3
9	塑膠盒塑膠製品	7	1.2

資料來源：《國際統計年鑒》相關數據。

當然，由於新的商業模式的挑戰和商業環境的改變，最近幾年新加坡製造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開始出現了下滑勢頭，與此對應的，經濟增速也應聲滑落。為了應對這種變化和挑戰，新加坡政府積極干預，創新和生產力研究所應運而生，以幫助企業重新界定自己的商業模式，實現企業內部的改革創新、提升效能，形成新的創收模式（劉旭穎，2015）。

同歷史和區域地位類似的香港相比，新加坡有前瞻性、預見性地發展起來的經濟比香港自由生長的經濟在產業結構上更加合理，發展潛力似乎也更大。理論上說來，即使香港已經失去了製造業，但若能與大陸緊密互動的話也是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式。但王建（2013）的研究顯示，自 90 年代後期以來，香港的產業結構變動方向與中國內地逐漸不匹配，甚至開始漸行漸遠。

（二）產業固化與就業排擠並存

1. 產業固化

香港經濟目前主要由四個主要行業和六大優勢行業構成，四個主要行業指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金融業、專業服務及其他生產性服務，六大優勢行業指文化及創意產業、醫療產業、教育產業、創新及科技產業、檢測及認證產業以及環保產業。香港經濟的四個主要行業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從 2000 年的 49.4% 上升到 2007 年最高的 60.3%，其後略有回落，到 2014 年比重為 57.5%，在這 15 年時間裏，四個主要行業的增加值總體是呈現上升趨勢的；六大優勢行業的增加值佔 GDP 比重從 2008 年的 7.4% 上升到 2014 年的 9.2%，也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如圖 5 所示）。總結起來，六大優勢行業所佔比重雖處於上升趨勢，但由於總體規模較小，因此香港經濟由四個主要行業主導的現狀非常明顯，產業固化特徵比較明顯。

2. 就業排斥

香港經濟是以四個主要行業為支柱產業，不過由表 5 可以發現，在這四個行業中，只有貿易和物流行業的就業比重/產業增加值比重略有上升，其他三個行業均在減少。⁴也就是說，在這 15 年時間裏，雖然這四個主要行業增加值比重上升了，但是能夠吸納的勞動力比重卻是下降了。這其中金融服務業表現尤甚，雖然其產業規模一直在擴大，但是相對來說吸納的勞動力比重減少的卻非常快。

⁴ 需要注意的是，早在 2013 年，李嘉誠旗下的碼頭工人就抗議多年來工人工資的有減無增。但李嘉誠的回復則是，在碼頭操作日益自動化的今天，能夠保住工人的飯碗就已經非常不易。因此，貿易與物流行業就業比重/產業增加值比重上升的趨勢或許也將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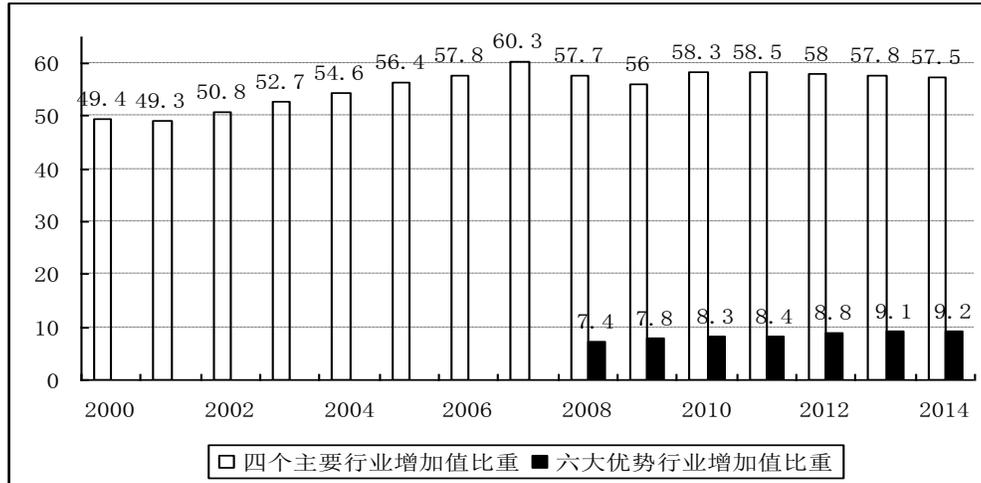
⁵表 5 香港經濟四個主要行業和六大優勢行業的就業比重/產業增加值比重

年份	四個主要行業				六大優勢行業					
	金融服務	旅遊	貿易及物流	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	文化及創意產業	醫療產業	教育產業	創新科技產業	檢測及認證產業	環保產業
2000	0.41	1.5	0.99	2.25						
2001	0.45	1.61	1.08	2.17						
2002	0.45	1.48	1	2.19						
2003	0.41	1.75	1.01	2.24						
2004	0.4	1.57	1	2.2						
2005	0.38	1.5	1.01	2.27						
2006	0.32	1.59	1.14	2.25						
2007	0.27	1.65	1.04	2.14						
2008	0.35	2	1.06	1.92	1.38	1.54	1.60	1.17	1.33	3.00
2009	0.38	1.72	1.03	1.78	1.35	1.40	1.80	1.14	1.33	3.00
2010	0.38	1.44	1.06	1.81	1.20	1.40	1.90	1.14	1.33	3.33
2011	0.39	1.47	1.06	1.74	1.15	1.50	2.00	1.14	1.33	3.67
2012	0.4	1.47	1.03	1.63	1.12	1.47	1.82	1.14	1.00	3.67
2013	0.38	1.44	1.07	1.66	1.10	1.47	1.67	1.29	1.33	3.67
2014	0.38	1.41	1.09	1.65	1.14	1.44	1.67	1.29	1.33	2.75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相關統計資料

⁵注：由於“香港政府統計處”在不同的統計報告中，四個主要行業的相同年份的就業和產業增加值比重有所出入，因此，本文的數據選取也存在這一定的困難，但是這並不影響此處的結論。

圖 5 香港經濟四個主要行業、六大優勢行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 (%)



注：六大優勢行業從 2008 年開始統計。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相關統計資料

另外，香港六大優勢行業增加值所佔比重這幾年來一直呈現出上升的態勢（圖 5），這是非常可喜的變化。不過，除了創新科技行業，就業比重/產業增加值比重略有上升之外，其他五大行業均減少或保持不變。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謂的就業排斥與比較勞動生產率概念正好相反。⁶因此，從理論上說，一行業勞動排擠力度越大該行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就越高，意味著資本愈加密集或技術水準愈高，這本來應該是好事情，但由於香港這些年來經濟增長愈發依靠這些產業（即行業增加值在 GDP 中所佔比重越來越高），這實際上表明了，香港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被邊緣化的殘酷現實。香港大學生找工作越來越難，並且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願意去內地找工作也佐證了這個事實⁷。

（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

1. 行業內和行業間差距情況

如表 6 所示，從行業內來看，除了運輸、倉庫及通訊業堅尼系數略有減少，從 2001 年的 0.405 略降到 2011 年的 0.404 外，其他所有行業都在增加。建造業的行業內堅尼系數最低，不到 0.4，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和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堅尼系數最高，均超越 0.5，而且還在持續攀升。

⁶ 所謂比較勞動生產率是指，一個部門的產值比重同在此部門就業的勞動力比重的比率，它反映該部門 1% 的勞動力所生產的產值在整個國民總產值中的比重。

⁷ 新華網的調查顯示，超七成受訪香港大學生願意在內地工作及發展。鏈接：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6/10/c_1115577247.htm。

從行業間來看，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的收入一直最高，在普查的三年中一直穩居首位，且與其他服務行業收入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例如，2001年，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與運輸、倉庫及通訊業收入中位數中間的比率為1.33倍，到了2011年變成了1.45倍。與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住宿膳食業之間的比率從2001年的1.43倍上升到2011年的1.60倍。製造業和建造業收入水準上升比較快，不過這兩個行業就業比重比較低，對行業間收入差距的影響不會非常大。

表 6 相關產業行業內與行業間收入差距情況

行業	2001	2006	2011
	收入中位數（港元）與堅尼系數（括弧中數字）		
製造業	10500 (0.447)	10500 (0.481)	13000 (0.479)
建造業	10000 (0.346)	10000 (0.362)	12000 (0.385)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	9800 (0.440)	9500 (0.456)	10000 (0.456)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10500 (0.405)	10000 (0.404)	11000 (0.404)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14000 (0.532)	12500 (0.544)	16000 (0.548)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0000 (0.529)	8500 (0.532)	9290 (0.539)

資料來源：《香港 2011 人口普查——住戶收入分佈報告》表 5.2 和表 5.3。

2. 住戶收入差距拉大

香港住戶收入的百分位比率也不斷被拉大（表 7）。所謂的百分位比率是指，將所有住戶按收入進行排列，計算在選定百分位的原本住戶每月收入。第 10 個百分位的原本住戶每月收入以 P10 代表，依次類推。百分位比率可以考察不同收入水準的人群收入水準變化情況，從而可以識別收入分配差距的變化情況。顯而易見，百分比率越大，處於這兩組的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越大。

表 7 2001-2011 年香港按每月住戶收入的百分位比率

	百分位比率	2001	2006	2011
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P90/P10	11	12.8	15.4
	P80/P20	4.5	4.8	5.2
	P80/P50	2	2.1	2.1
	P50/P20	2.2	2.3	2.4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P90/P10	11.3	13.1	16.1
	P80/P20	4.4	4.7	5.2
	P80/P50	2	2.1	2.1
	P50/P20	2.2	2.3	2.4

資料來源：《香港 2011 人口普查——住戶收入分佈報告》表 5.2 和表 5.3。

3. 與新加坡的堅尼系數對比

如果將香港堅尼系數新加坡做比較（表 8），我們發現，儘管新加坡堅尼系數非常高，但是與新加坡相比，香港的堅尼系數更高。不論是按住戶收入計算還是按除稅和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計算，香港的堅尼系數都遠高於新加坡，按住戶收入計算的香港堅尼系數一直在 0.5 以上運行而且還在持續擴大，按除稅和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計算雖然低於 0.5，但是卻呈現出上升的趨勢。

表 8 香港與新加坡堅尼系數的相關比較

時間	香港堅尼系數		新加坡堅尼系數	
	按住戶收入	按除稅和福利轉移	按住戶收入	按除稅和福利轉移
2001	0.525	0.47	0.456	0.437
2006	0.533	0.475	0.476	0.446
2011	0.537	0.475	0.482	0.452

資料來源：《香港 2011 人口普查——住戶收入分佈報告》表 8.1 和表 8.3。

與新加坡不同的是，香港收入差距的堅尼系數不僅高，而且財富集中度更為驚人。《香港 2011 人口普查——住戶收入分佈報告》顯示，香港從 2001 年到 2011 年間，月收入超過 5 萬港元的人士由 15% 上升至超過 20%，少於 1 萬港元的則由 15% 下降到 12.5%。同期的新加坡 5 萬元的則由 35% 上升到 40%，少於 1 萬元的則由 20% 下降到 7.9%。由此可以看出，香港財富集中的馬太效應愈加明顯，而新加坡脫貧效果則比較顯著。另外，

2016年，根據彭博億萬富豪指數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GDP估值顯示，香港十大富豪的財富相當於香港GDP的35%，遠超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印度十大富豪的財富僅相當於本國GDP的5.2%，中國大陸更是只有1.4%。在歐洲，富豪財富/GDP比例最高的瑞典為25%，瑞士為9.2%，俄羅斯為8.8%。香港財富的這種過度集中與其產業結構的固化是分不開的。

（四）房地產“陷阱”

理論上，香港已開發的土地只佔全港1105平方公里土地面積的25%左右，剔除佔40%左右的不能和難以開發的土地外，還有35%的可以開發但卻未開發的土地，這還沒有包括填海造地。但由表9可見，香港的房價從2004到2014年這11年的增幅巨大。其中，香港島2014年的房價是2004年的3.28倍，九龍是3.49倍，新界最少，但也達到了3.02倍。而按照當年價格計算的人均GDP來看，2004年為190451港元，2014年為311479港元，2014年為2004年的1.64倍。將房價上漲的幅度與人均本地生產總值上漲幅度比較起來看，前者是後者的2倍左右，對於普通的無房群體來說，居者有其屋成為了“遙不可及”的夢想，香港僅有超過半數的居民擁有私人房屋，⁸房地產經濟的利潤由寡頭和政府共同瓜分。

表9 相關年份香港房屋有關數據統計

私人永久性房屋價格（港元/平方米，當年價格）	2004	2009	2014
香港島	39444	68709	129487
九龍	30669	51266	107027
新界	27620	39279	83440
按房屋類別劃分的人口分佈情況（單位：%）	2004	2009	2014
公營永久性房屋比重	49.0	47.1	45.7
私人永久性房屋比重	50.2	52.2	53.8
臨時房屋	0.8	0.7	0.6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公佈的報告《房屋統計數字，2015》。

需要注意的是，居高不下的房價不僅嚴重惡化了收入不平等，而且高房價嚴重打擊了實體經濟，這又會反過來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水準，惡化實體經濟競爭力。目前，內地也正在經歷這個過程，以位於深圳的華為為例，最近“華為外遷”的傳聞鬧的沸沸揚揚，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根據深圳規劃國土委的數據，深圳2016年3月的新房成交均價已高達49989元/平方米。任正非在2015年接受新華社採訪時，明確表達了對房地產泡沫的厭惡，“高成本最終會摧毀你的競爭力。而且現在有了高鐵、網路、高速公路，活力分

⁸ 若考慮到很多高收入人群不止有一套住房的現實，擁有私人房屋的擁有率還會更低。

佈的時代已經形成了，但不會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工業現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來換取工業的成長。現在土地越來越少，越來越貴，產業成長的可能空間就會越來越小。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設施。生活設施太貴了，企業就承載不起；生產成本太高了，工業就發展不起來”。⁹對於香港來說，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的衰退何嘗不因為此呢！

三、香港經濟再次崛起的保障：“有為”政府

（一）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困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曾視香港為自由放任經濟典範，其一生中多次把香港作為自由放任經濟體的代表。自由市場經濟體系是香港經濟最基本的特徵，也是促使其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是以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為指引，“看得見、摸得著”的利潤為導向，通過價格信號對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最終實現生產者的利潤最大化和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不過，完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經濟學基本理論指出，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政府的不干預、“自由放任”政策對於保護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非常有利，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後，根據優勝劣汰的生存法則，一些行業慢慢出現了壟斷勢力，如果政府不進行有效干預，就會形成壟斷資本甚至利益集團。嚴飛（2008）指出，香港的“積極不干預”的實質是以英資財團的利益為基礎。現實中，動物在合適生長的地方才能夠生存繁衍，同樣，若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從事於科技創新的企業無法出現的話，那說明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並不適合科技創新型企業的生存。以房地產為代表的利益集團的出現嚴重惡化了香港製造業的生存環境，具有高投入、高風險特徵的高科技行業根本無法生存，扼殺了香港經濟的前途，最終看似公平的自由市場競爭體制最終卻變得極為不公平，愈窮愈窮，愈富愈富的“馬太效應”隨處可見。

（二）“有為”政府的建立

1. 提高政府作用，化解發展困境

如果認真考察那些在經濟發展中取得成功的國家或地區可以發現，儘管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政府發揮作用的邊界有大有小，但他們在支持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政府進行超前引領方面都是一個“強政府”。日本是這樣，新加坡、韓國也是如此。過高的收入差距無法自動癒合，當前世界以“互聯網+”和“工業 4.0”為代表的科技進步突飛猛進，純粹依靠自由市場機制體制推動以高風險、高投入為顯著特徵的高科技行業發展也顯然是一廂情願，政府

⁹ 網上關於此事的報導非常多，可以搜索“任正非：高成本最終會摧毀你的競爭力”，查看相關報導。

的積極參與和強力作為必不可少。2013年特首梁振英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了，經濟要發展，政府就要“適度有為”的口號，在接下來施政的幾年間，這個思想一直貫穿始終，不過受到的干擾也不少。應該說，這是一個比較好的開始，但還遠遠不夠。在關乎社會穩定、科技創新支撐上面，更應“強力作為”。

當然，有人或許認為這樣會破壞香港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不過，本文認為，提高政府的作用並不是要否定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港府可以“為所欲為”，完全按照特首和政府的意旨去做事情，而是說港府要在化解社會矛盾上、在香港經濟下一步發展的路徑選擇上要積極主動，發揮主導性和引導性作用，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更好運行打好基礎。旺角騷亂、港獨的愈演愈烈以及科技創新能力的缺失等早已說明了“有為”政府的缺失所帶來的困境，若港府不及時、儘早的把這些問題妥當處理好，必將會產生更為嚴重的後果。所有這些實際上都告訴我們，香港政府的執政理念和模式已到了需要做出重要改變的時候了。

2. 強化政府權威，推動執政理念落地

香港自從回歸大陸以來，政府的執政理念和相關政策一直比較難以落地。以房地產市場為例，香港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1997年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承諾，大幅度增加未來的建屋量至每年85000個單元，住房自有率達70%以及出租公屋輪候期少於3年（簡稱八萬五建屋計畫）。但不幸的是，該計畫推出之後，恰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香港房價大跌，在2000年左右被迫終止了85000建屋計畫。在這之後，“大市場、小政府”成為香港特區政府的政治圖騰（李思名，2014）。在1998年以前香港執行的是定期賣地制度。但亞洲金融危機後，香港樓市大跌，同時房地產企業停止購入土地，地價大幅度下跌，港府為了保證土地不被賤賣，暫停了土地拍賣，轉而執行勾地政策。在這一機制下，政府實現了從主動調控供應並參與發展到改由市場主導（發展商自行決定勾地與否）的轉變。這樣一來，房地產開發商便主導了土地一級市場開發，為了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他們減慢了建屋速度，房價重新進入了上升軌道。2010年之後，為了控制房價的過度上漲和投機行為，香港特首曾蔭權政府對房屋交易開始徵收15%印花稅，並重新對《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所確定的打古嶺、古洞北、洪水橋等新界東北和新北的土地進行開發，但遭到了來自包括環保團體、社運組織和“泛民主派”等的挑戰，土地開發最終不了了之。第三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2013年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特區政府要幫助草根階層“上樓”（能夠住上出租公屋），協助中等家庭置業，重建“居者有其屋”為住房階梯的重要一環，建構一個健康的私人住房市場，並以香港居民為優先服務對象。但是該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仍然面臨著不同的政治團體和非政府組織以保護當地的農業和生活方式等理由，不斷發起各種各樣的抗爭活動。

由於香港特首並不隸屬於任何政黨，而立法會議員卻是由民選產生，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階級，互相爭執，因此特首的行政主導模式被大打折扣。再加上相關利益集團和民間組織的參與，港府有關政策受到的阻撓越來越多，政策落地的難度也越來越大。最後的結果就是，相關利益方為了一己之私阻礙了香港經濟的長期增長和繁榮，損害了絕大多數香港人的長遠利益。因此，本文建議，只要是經過長期醞釀的，受到多數方認可的，並且對香港長期來講是有益的政策制度安排，就要排除萬難，堅定去落實。¹⁰

四、香港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

1. 推動行業跨區域融合

雖說第三產業所佔比重高低是衡量一個經濟體是否發達的重要標誌，但縱觀全球各個經濟體，並沒有哪個重要的國家或地區會真正放棄第二產業即工業。對於香港來說，2000年時工業佔經濟總量的比重還接近14%，而到了2014年底，香港工業佔比已接近7%，在這其中製造業佔比居然還沒有達到1.5%。且更致命的是，工業的衰退再加上內地加入WTO，開放程度日益提高，香港服務業與內地經濟之間的融合度已越來越低。例如，2000年時廣州港的貨物吞吐量還剛剛超過香港的一半，但是到2011年已經比香港高出1/3，香港的作用日益下滑。在此背景下，金融、貿易物流等行業優勢正逐漸消失，這是香港經濟逐漸喪失增長動力的內在邏輯（王建，2013）。

當然，由於香港的高房價以及過高的人工成本等，香港“再工業化”已顯然不太現實。鑒於製造業的重要性，對於香港來說，下一步發展的重點在於，一是利用“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的發展機遇，通過自身在生產性服務業方面所具備的強大優勢，進一步提升與珠三角乃至更廣闊區域產業互動的能力和水準；二是鑒於香港人口有限、土地面積不足的制約，又由於深圳有著與其它地方合作在當地設立科研院所和科技公司的經驗，香港應加強與深圳等地在科研創新教育方面的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利益共用，協同創新；三是實施差異化發展戰略，運用自身在處理複雜或長期合約，法治和產權保障等方面的優勢，大力發展專門金融業務，包括衍生工具、財富管理、保險及再保險等行業。不斷推動香港的科技研發成果和創新能力等與內地相關產業互動、融合。

2. 提高科技創新的政府支持力度

我們看到，香港企業的發展模式更多是套利型的，講求的是對市場機遇的判斷和風險的把控能力，這其中以“四大家族”最具代表性。而高科技行業具有高風險、高投入，但並

¹⁰ 當然，具體如何去落實肯定要涉及到一系列政治層面的制度設計和機制改革，這並不是作者所擅長的也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在這裏略去不談。

不一定有高回報，甚至還有全部“打水漂”的可能，因此，能承擔高風險的企業更是少之又少。90年代以來，儘管香港陸續建立應用研究發展基金、實施“自動化計畫”、科技工業中心等一些發展科技的專案，香港科學園三期已投入使用，並且已成立了香港創新及科技局，但投資和支持力度仍然明顯不夠，“官、產、學、研”的融合方式、方法仍然需要不斷探索，融合的深度仍然需要不斷加強。

本文認為，香港下一步要著重大力發展大數據中心、高等教育、電影業、生物科技和醫療等相對獨立性較高的高端生產性服務業。¹¹以醫療行業為例，其所服務的對象是病人，只要醫療技術高超，醫療設備先進，具有開放性，自然就會有病人來港就醫，因此這些行業並不像那些必須依附於基礎製造業的高科技行業那樣，具有相對獨立性。由於香港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製造業基礎，因此像醫療、教育等相對獨立性的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在香港下一步的發展中便具有顯著的比較優勢，大有前途可為。因此，下一步港府必須全力破除這些行業成長的壁壘和障礙，允許大陸相關病人來港就醫，大力支持醫療方面的科研創新和制度改革，消除行業進入壁壘，推動類似《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的一些草案儘早獲批，讓香港的教育借力“一帶一路”戰略完全走出去等，讓那些具有相對獨立性的行業成為香港下一步發展的最具全球競爭力的行業之一。

3. 從“引進來”到“走出去”

按照李小加（2016）的看法，¹²香港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中主要做了三件大事，即轉口貿易、直接投資和資本市場發展。轉口貿易指將中國的產品賣出去，¹³直接投資指80年代香港大量製造業產業向大陸的轉移，資本市場的大發展指大量的中國企業最初是通過在港交所上市融資，進而促進了這些企業的快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香港做的主要是如何將錢和資本轉移到中國大陸去。在這之後，隨著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的持續深入和經濟的快速崛起，資本和大量的工業產能也開始出現過剩，這些資本和過剩產能需要走出去尋找市場和商機。對於香港來說，本來在大陸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已有所弱化，而大陸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這個趨勢轉變，再次為香港帶來了機遇，香港下一步必須要充分地抓住這個戰略轉換機遇，推動香港經濟與大陸經濟的再次融合。具體說來：

一是推動以人民幣計價的各類金融產品走出去。2015年，隨著人民幣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納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正式成為了國際儲備貨幣。以人民幣為計價單位的相關資產、以人民幣為主體發行的各類債券、以滬港通和深港通為代表的股票市場必將迎來大發展，在內地資本帳戶仍然未全部放開的背景下，香港的金融市場將又一次迎來絕佳的

¹¹ 所謂相對獨立性較高是指這些行業可以比較獨立的發展並不像很多高科技行業那樣，需要基礎製造業的支撐。

¹² 具體請參見李小加在2016年2月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六屆年會”上的相關發言。

¹³ 轉口貿易是通過香港將產品出口到國外去，並最終通過香港將外匯匯回國內。

發展機會。¹⁴因為聚結經濟及網路界外利益等因素，先行者有明顯優勢，只要香港牢牢佔據先機，即使內地以後的資本帳戶全面開放，也很難動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是為資本和產業走出去提供服務支撐。近些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這裏指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快速膨脹。根據商務部的統計數據，截至 2015 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已超過萬億美元大關。埃森哲（Accenture，2010）針對中國 500 強企業問卷調查顯示，89%的企業已開展全球化業務。這其中，擁有全球戰略、全球管理和全球責任並且跨國程度超過 50%的公司少之又少，而且這些企業大多還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跨國性質及跨國經營能力，擁有明確的全球投資戰略、全球化的生產體系以及高效管理當地業務的中國跨國企業更是非常缺乏。面對全新的對外直接投資格局和更加複雜的對外直接投資新形勢，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亟需引導，而香港在這方面具有著天然的優勢：一是香港大量企業均是國際化的經營模式，對國際並購和運營早已積累豐富的案例和經驗，二是在長期的跨國際化經營中積累了大量的人力資源，並且對國外的法制、環境以及相關政策安排等都非常熟稔。這些都能夠為大陸企業“走出去”從事前、事中和事後等全角度、多方位提供支撐服務。

三是形成大宗商品定價中心。這些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已成為了世界上大宗商品最大的消費者和很多大宗商品的生產者。但遺憾的是，中國仍不是這些商品價格的制定者。下一步，中國不應該再重複簡單的大宗商品購買、生產和銷售，而是要利用自身影響力重新塑造世界商品定價體系，要能夠在資產的處置上“走出去”，掌握大宗商品世界定價權。而香港完全具備利用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開放的經濟體系，構建這個定價平臺的能力。

4. 深度融入“一帶一路”戰略，強化香港中心地位

建設“一帶一路”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部署，是中國下一步改革開放的最重要思路和舉措。“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作為全球金融、貿易中心和航運樞紐的香港既坐落在亞太經濟圈，又是聯繫歐洲的天然紐帶，區位優勢、金融優勢、航運優勢、資訊人才優勢異常明顯。不過，雖香港擁有這些優勢但優勢並不會輕易轉化為現實，這需要務實的態度、接地氣的策略。特首梁振英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亦 42 次提到了“一帶一路”戰略，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提出了“五通”等對接措施。目前，與“一帶一路”相關的議題已緊鑼密鼓地展開。

在我看來，“一帶一路”戰略給香港的最大機遇在於，“一帶一路”戰略能夠讓香港的傳統優勢行業再次得以彰顯，放大這些優勢，強化香港在全球貿易、金融和航運中心的地位。以金融業為例，雖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但是目前正面臨著上海等內地城市的激烈競爭，

¹⁴ 當然，要達成此目的，更需要“一帶一路”戰略的配合，詳見下文。

隨著資本帳戶的逐步放開和人民幣自由兌換，香港與上海在國際金融業務方面的競爭將更為激烈（宋恩榮，2012）。本文認為，對於香港來說，為了避免將來可能出現的尷尬局面，就應該充分抓住“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的機遇，利用國際性金融中心城市地位，做大做強人民幣離岸業務，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如表 10 所示，中國的 GDP 與其貨幣國際市場佔有率情況極其不匹配。例如，2015 年中國 GDP 超過 10.8 萬億美元，僅次於歐元區的 11.5 萬億美元，但是歐元的佔有率情況是人民幣的 16.5 倍，英國退歐也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提供了絕佳機遇。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相比大致也非常懸殊。這些事實暗示了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大有可為。

¹⁵表 10 十大國際支付貨幣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貨幣	美元	歐元	英鎊	日元	加元	人民幣	澳元	瑞郎	瑞典克朗	港元
市場佔有率(%)	41.92	30.09	8.40	3.24	1.83	1.82	1.56	1.50	1.09	1.06
GDP (百億美元)	1796.8	1153.9	284.9	412.0	157.3	1086.5	124.1	> 67.7	48.4	30.8

資料來源：市場佔有率來源於 SWIFT，GDP 數據來源於 IMF。

具體策略如下，一是由於亞洲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部分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對外貿易佔比較大，這些國家相互之間貿易量非常大，亞洲 50% 以上的貿易是在本區以內，不過使用的結算貨幣主要為美元。但一旦美元無法穩定供應，流動性出現問題，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都無法進行。若在這個過程中有另外一種貨幣，例如人民幣，則可以化解單一結算貨幣所帶來的這種困難。隨著人民幣加入 SDR，標誌著人民幣有了走向多邊化使用的可能性，香港通過其成熟的金融市場和國際融資能力，完全能夠通過大力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解決上述難題，並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二是“一帶一路”的戰略實施需要巨大的資金支持，特別是在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方面。亞洲市場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國際債券市場發展比較滯後，且以短期債券為主，缺乏長期債券。若香港能夠透過“一帶一路”戰略發展長期債券市場，並且部分實現人民幣化，則將使香港由過去的跨境安排的國際金融中心向多邊安排的國際金融中心轉變。香港應該緊緊地抓住“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的機遇，成為以人民幣為計價單位的各類金融產品的全球離岸中心和定價中心。

¹⁵注：市場佔有率數據統計截止到 2016 年 4 月，GDP 為 2015 年相關數據。另外，歐元區數據為本文作者將歐元區 19 個國家 GDP 相加得到；使用瑞郎的國家不僅是瑞士，由於本文中的數據僅為瑞士，所以用大於號表示。

五、結論與展望

以上分析指出了香港的問題，一是由於香港過早“去工業化”，經濟發展越來越固化在金融、貿易、地產及其相關行業，隨著內地的持續、深入開放，香港在金融、貿易等方面的優勢正在不斷弱化；二是香港目前的 GDP 有超過一半是由金融、貿易、地產及其相關行業創造的，但這些行業所能夠創造的就業機會卻越來越少，再加上香港早已“去工業化”，中等收入階層逐漸消失，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三是由於港府一味遵循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迎合資本的利益，把重商主義發揮到了極致，投入大、風險高的高科技產業很難有成長空間；四是由於大量利益集團的干擾，再加上本身的弱勢地位，港府政策難以落地。針對上述問題，本文認為關鍵在於，強化港府作用，提高政府權威。具體說來，推動行業跨區域融合，推動科技創新，尤其要在相對獨立性較強的生產性服務業方面下功夫。轉化自身功能定位，從“引進來”向“走出去”轉型。充分利用“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的機遇，重新打造新的優勢，並不斷強化固有的國際中心地位。

香港經濟的傳統是奉行所謂的“自由放任”政策，七十年代末提出了“積極不干預”主張，被稱為“大市場，小政府”，該主張認為政府有責任基於社會考慮和維持公平而作出干預行動。到了今天，面對經濟的不景氣和各種社會亂象，“積極不干預”主義早已顯得不合時宜。現任特首梁振英適時提出了“適度干預”的主張，不過由於社會各界已習慣於過去非常寬鬆的監管，再加上已有利益團體等的干擾，“適度干預”主張實施起來非常困難，這也恰恰折射出了香港未來改革所可能面對的嚴峻局面。香港經濟崛起的過程曾經被歸納為“獅子山下精神”，“獅子山下精神”有應變、勤奮、創意和包容等元素。香港的老一輩知道，一切機遇都來之不易，因此他們的工作態度總是默默耕耘、不計較回報。當前，香港經濟的輝煌已隨著外部大勢的轉變和內部問題的逐步暴露告一段落，香港經濟下一步發展的出路正在不斷尋覓和突破過程中，這既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也需要港府的有效作為，更需要香港社會各界的長遠眼光、精誠合作和務實工作態度，跳出香港來看香港。香港更加燦爛的明天需要社會各界重拾“獅子山下精神”。

參考文獻：

- 1.陳恩.香港金融貿易中心會被上海取代嗎[J].嶺南學刊，1997(1):86-89.
- 2.李思名.回歸後香港的土地和住房政策政治經濟分析[J].當代港澳研究，2014(2):17-27.
- 3.劉旭穎.新加坡製造業迎風而行[R].國際商報，2015-06-02.
- 4.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新在何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 5.宋恩榮.香港與華南的經濟協作[M].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
- 6.宋恩榮.香港與上海作為全球服務樞紐競爭活互補？[R].香港亞太研究所，2012(1),No.218.
- 7.王建.香港經濟增長能力衰退的現狀與原因[J].來源於中國統計年鑒，2015年.
- 8.尹翔碩，黃亞鈞.試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對內輻射作用的局限性——兼談建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性[J].上海金融，1998(4):9-12.
- 9.嚴飛.政府干預 VS 放任市場:香港的實踐[J].社會學家茶座，2008(2):29-32.